

※書目文獻※

《古詩紀》編纂背景一探 ——與《古詩類苑》的關係

雷之波*

一、前言

馮惟訥(1513-1572)的《古詩紀》¹是二十世紀前蒐集唐以前詩歌最全面的一部總集。二十世紀初丁福保(1874-1952)編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，基本上只是糾正了《古詩紀》漢一唐部分一些較為明顯的錯誤，而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遼欽立(1910-1973)遺著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也是建立在《古詩紀》的基礎上。遼氏《詩》是一部非常嚴謹的學術著作，它的水平遠遠超過《古詩紀》，正因如此，《古詩紀》較少引起當代學術界的注目。本文從前人對《古詩紀》的一處矛盾評論出發，對該書編纂背景做一次初步的探討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古詩紀》稱：

厥後臧懋循《古詩所》、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、梅鼎祚《八代詩乘》相繼而出，總以是書為藍本。²

後代學者多沿襲《四庫提要》的說法。例如清末學者楊守敬(1839-1915)，曾用不少心力準備對《古詩紀》進行增補修訂，他的《古詩存目》把所有唐以前詩歌的出處逐一找出，是遼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的主要參考資料，而楊守敬該書序

* 雷之波(Zeb Raft)，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(University of Alberta)東亞研究系助理教授。

¹ 此書正名為《詩紀》，無「古」字，後世慣稱《古詩紀》，可能是為了與後出《唐詩紀》區分，也可能是受《四庫全書》的影響。本文仍稱《古詩紀》，以免誤會，但《詩紀》之為名與《古詩紀》意味不同，或許不應忽視。

² [清]紀昀等編撰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（整理本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2644。

言的說法與《四庫提要》相類似：

《詩紀》見聞殊博，大端已具（張之象、張溥等皆因馮書變其體例，其實無所增損）。³

但是，遼欽立一九六四年寫成的〈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後記〉則稍有不同：

馮書的編成，大多因襲劉〔節〕的《廣文選》、張之象的《古詩類苑》、包節的《苑詩類選》等書。⁴

《四庫提要》與楊守敬所提及的臧懋循、梅鼎祚、張溥（即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，此書實以張燮《漢魏六朝七十二家集》為基礎，從馮氏書補充三十一家）諸作，確實都編在《古詩紀》之後，也確實都從《古詩紀》吸收了大量材料，梅鼎祚《詩乘》序已明確聲明「北海（按：馮惟訥號）之為功甚偉，其何敢貪之」。至於遼欽立所論的劉節《廣文選》與包節《苑詩類選》（即《文苑英華》所載詩歌的類編），都是比較早的總集，馮惟訥曾加以參考，兩書已列在《古詩紀》的引用書目，只是兩書收作範圍均比馮書窄，徑謂馮氏「因襲」之，似亦未妥。

此中惟張之象(1507-1587)《古詩類苑》一書，《四庫提要》和楊守敬的看法與遼欽立的意見正好相反。《四庫提要》與楊氏認為張書出自《古詩紀》，遼氏反而認為《古詩紀》是抄自張書的。而遼氏在一九四三年寫成的〈《古詩紀》補正敘例〉也曾經說過：

後之如臧懋循《古詩所》、梅鼎祚《八代詩乘》，皆依據馮本，增益蓋寡。⁵顯然是對《四庫提要》說法的修訂，把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抽出來。但遼氏也未說明是什麼理由才把《古詩類苑》排在《古詩紀》前面，欲知孰是孰非，須看這兩本書的編纂背景。

二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古詩紀》

要理清這個問題，可先從《古詩紀》的版本說起。《古詩紀》第一版是一五六〇

³ 楊守敬著，謝承仁整理：《楊守敬集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8-1997年），第6冊，頁1061。

⁴ 遼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2788。原文劉節誤作劉履。

⁵ 遼欽立遺著，吳云整理：《漢魏六朝文學論集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109。

年在關中地區出版的，但目前最容易見到的本子應屬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而《四庫》用的底本則是《古詩紀》的第二版，萬曆年間由吳琯（一五七一年進士）負責校刊，即所謂「吳琯本」。吳琯本卷首有汪道昆、王世貞兩人的序，汪序後有「金陵徐智督刊」字樣。汪序是一五八六年寫的，應視為一五八六年或稍後出版的⁶。

《四庫》本與它的底本吳琯本不盡相同。吳琯本卷首的內容為：

汪道昆《詩紀》合序

王世貞《詩紀》序

張四維《詩紀》序

引用諸書

凡例

目錄（作者、篇名俱備）

檢視《四庫》本，在提要之後只有：

張四維《古詩紀》原序

凡例

其後緊接著是正文的卷一，總目錄、卷目錄皆不見。

《四庫》本少了兩篇吳琯本的序文，這兩篇序的內容有些已經包含在提要裏，而且均見於《四庫》所收其他書裏面，《四庫》本刪之，似不傷大體。目錄沒有抄入，對讀者不太方便外，也沒有什麼大問題，這樣做也許是《四庫》的通例，省了一些抄書的時間。關鍵在「引用諸書」與「凡例」。凡例《四庫》本有，但只有二

⁶ 汪序題作「詩紀合序」，即此《古詩紀》與吳琯、黃德水所編《唐詩紀》的合序，後一書是1585年出版的，故《古詩紀》應該也在1586年或稍後出版的。王世貞序未題年月日，但王死於1590年，則此書至少應出現在1590年前。惟梅鼎祚編撰《八代詩乘》有1605年編者序，稱馮《詩紀》「版在關中，江以南不皆經見」，顯然不知道有吳琯本。是則1586年吳琯本行世不廣？抑或其得汪、王兩序之後則置之多年，不曾出書？

又，據王重民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（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〕，頁437-438）吳琯本可能在萬曆期間有一次重刊本，具體情況不明，可參看李慶立、張秉國著〈《古詩紀》考論〉，見《韶關學院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2003年第2期，頁1-4的討論。惟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另有一次刊本，有學者將之視作吳琯本，實則不然。1613年版係馮惟訥長孫馮珣任官於關中時，看到原本版刻，「痛流風之漸滅，念手澤之猶存」（見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馮珣跋語），先擬修刻，後由嘉興人黃承玄等人出資，在吳地區按照馮惟訥原版形式重刻。

十一則，它漏抄了吳琯本的最後十四則。可能是漏抄，也可能是《四庫》所用的底本本來就缺頁，因為所漏的凡例剛好從吳琯本的第五頁（上）的第一欄開始（參看圖一、圖二）。至於所漏掉的內容，下文將述及。

「引用諸書」列了幾十種馮惟訥曾經參考過或引用過材料的書籍，有一手材料的來源（如《史記》，提供了很多先秦歌謠），有後代之總集和別集（前者如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，上舉《廣文選》、《苑詩類苑》亦在其內；後者如《陶淵明集》等十五種中古時期文人的別集），亦有詩話詩評一類的著作。《四庫》本沒有把這份書單抄進去，很難理解，因為引用書目是有關馮書編纂的重要資料，它不像目錄，僅供檢閱方便之用。而且，對本文的考證而言，此書目提供至關緊要的訊息，因為《古詩類苑》正列在其中（圖三）。

馮書引用書目雖然不題作者名，然遍查諸目錄，《古詩類苑》一書名只有一種，是張之象編的⁷。遼欽立的看法應該是基於這條根據。那麼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說《四庫提要》的說法是錯的，因為馮惟訥確實參考過張之象的書？只是這兩部書的承先啟後的關係並沒有那麼清楚。

三、《古詩類苑》的編纂

《古詩類苑》的編者張之象是松江府上海縣人。他的生平有資料可徵，但對其行跡的敘述並不清楚。張之象是國子學的學生，但未能考中進士。其墓誌銘說他沒有做官的意圖，不過因為貧窮，他晚年在浙地當幕僚：

當是時，諸監司大吏率偉視公，折節相下，不欲煩以簿書，而公亦因得時乘
休暇，幅巾竹杖，駕一舸，嘯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，以「吏隱」自命。⁸

一五六七年辭官，以著述為務，但是他即使「屏跡城市」，可是仍然在江南文人圈頗有盛名，與同鄉董宜陽、何良俊、徐獻忠同號為當地「四賢」⁹。

⁷ 黃體仁《古詩類苑》序的開頭便說：「詩之有類苑也，自吾鄉先輩張玄超始也。」此論雖可商榷，但足見《類苑》之為體在當時並不普遍。

⁸ 〔清〕黃宗羲編：《明文海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1458冊），卷434，頁2b。

⁹ 見〔清〕趙弘恩等監修：《江南通志》（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511冊），卷166，頁6b。

張之象一生著作甚多，據墓誌銘：

所著書有《剪絲》、《翔鴻》、《聽鶯》、《避暑》、《題橋》、《猗蘭》、《擊轅》、《佩劍》、《林棲》、《隱仙》、《秀林》、《新草》諸集。所輯有《詩學指南》、《韻苑連珠》、《韻學統宗》、《楚語》、《楚範》、《楚林》、《楚翼》、《賦林》、《七萃》、《太史史例》、《史記發微》、《新舊註鹽鐵論》、《唐雅》、《回文類聚》、《詩紀類林》等編，夥不勝紀。¹⁰

有自己文集十二種，有詩學方面著作，有文學總集，有史學研究；《四庫全書》即收載他的《鹽鐵論》注，以及墓誌銘沒有提到的、他所整理的《老子》王弼注本；另《四庫》本《回文類聚》也是以他的整理本為基礎的。

惟墓誌銘不載《古詩類苑》與《唐詩類苑》，獨有《詩紀類林》，此誠為難解之題。近人楊焄著〈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編纂考〉，認為《古詩類苑》、《唐詩類苑》均係從此《詩紀類林》析出，引一六〇一年出版的《唐詩類苑》凡例語為證：

蓋玄超先生苦心歷二十餘年而就，以漢魏六朝詩彙為一集，以初唐至晚唐詩彙為一集，總名之曰《詩紀類林》。茲刻惟唐詩，因題曰《唐詩類苑》……。¹¹

惟《古詩類苑》已列於《古詩紀》「引用諸書」中，則一五六〇年《古詩紀》初版時已有《類苑》之名，與《唐詩類苑》凡例的說法相抵牾。又，《古詩類苑》有俞顯卿撰序，寫成時代在《唐詩類苑》出版之前，而該序中仍稱之為《唐詩類苑》，則《唐詩類苑》一名並非一六〇一年刻版時才加上去的¹²。其他《唐詩類苑》、《古詩類苑》諸序，亦無一不稱為《類苑》，均不見《詩紀類林》之名。

其實，《詩紀類林》一名，僅見三處，即：張之象墓誌銘，《唐詩類苑》所附〈王屋先生傳〉，以及上引《唐詩類苑》凡例。〈王屋先生傳〉為《唐詩類苑》整理者王徹所撰，與墓誌銘有相當程度的重複，惟比墓誌銘稍詳細，顯然與墓誌銘屬同一系統的材料，而《唐詩類苑》凡例亦出自整理者之手，則此材料之相符，實屬當然。事情的真相如何，只能做推測，或許是「才偉而位不達」（此〈王屋先生

¹⁰ 《明文海》，卷 434，頁 3a。

¹¹ 見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2007 年第 1 期，頁 117。

¹² 俞序云：「別有《唐詩類苑》若干卷，體例並同，並用自副，後有博雅，以公同好。」見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5 年），第 320 冊，序卷，頁 6a。

傳)語)的張之象原以《類苑》名其書，後因《詩紀》與後出《唐詩紀》廣為人所知，前者為當世聲名赫赫的馮惟訥所編，張氏才「總名之曰《詩紀類林》」¹³？根據筆者所蒐集材料，只能做出如此的推論，以待更多材料再做檢討，但《唐詩類苑》凡例的說法顯然不足，因而模糊了《古詩類苑》的真相。

《古詩類苑》原貌如何，今天不得而知。一五六〇年《古詩紀》初版於陝西時，《古詩類苑》已列在引用書中，但傳世《古詩類苑》是俞顯卿「補訂」本，有一六〇二年黃體仁序，距離張之象初編本已經四十多年，距張之象之死也有十五年。俞顯卿是張之象的同鄉，據他的序言，張之象編過很多書，因為貧窮，都沒有刻板，這是其中之一，遂被俞顯卿借去，「僱功繕寫，載為讎對，仍從裨補。梨棗未遑，藏諸家塾」。據黃序，《唐詩類苑》已在一六〇〇年（按：《唐詩類苑》有一六〇一年序，則此書之正式問世應該在此年）由同鄉的另一個書香世家出版，而《古詩類苑》則於一六〇二年由俞顯卿的弟弟俞顯謨，根據他哥哥的遺存本出版。如是，則今天所看到的《古詩類苑》與馮惟訥一五六〇年之前所看到的本子一定有出入，只是不知道出入的程度而已。

《古詩類苑》有凡例九則，目前無法確知哪些是張之象自己寫定的，哪些是補訂校正時增加的。凡例的第二、第三則均點名提到《詩紀》，至少這兩條是寫在《古詩紀》問世之後，但此是否代表所有的凡例都寫在《古詩紀》成書後，則尚難斷定¹⁴。有趣的是，凡例中有些跟《古詩紀》凡例相同或極類似的。茲錄之如下：

(一)

《古詩紀》：是編首自上古，下迄陳隋。唐宋以後詩人之作各有彙集，世得共睹，故不重錄。¹⁵

《古詩類苑》：是編首自上古，下迄陳隋，一枝片玉，搜括無遺。有唐一代之作，別為類苑，茲不重錄。

¹³ 楊文謂《唐詩類苑》出於《唐詩紀》，惟《唐詩紀》為吳琯與黃德水編纂，其出版在 1585 年，張之象死於 1587 年，想張氏之開始蒐集唐詩，必早於此年，則《唐詩紀》跟其書實際編纂工作應該沒有太大關係。不過楊氏認為《唐詩類苑》是張之象「晚年未定之稿」，經過後人的整理（前引文，頁 117-118）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¹⁴ 凡例後有一段敘述此編成書過程的話，後題「海上後學俞顯謨識」，此為俞顯謨識語，似不應視作凡例是俞顯謨自己寫的。

¹⁵ 茲引《詩紀》凡例，均依 1560 年刻本。如此條，吳琯本已刪去。

(二)

《古詩紀》：樂府所載晉宋以後郊廟、燕射樂歌，舊輯詩者咸析入各家集內。然此乃一代之典章，非一人所得專也。且其作之有宮徵，其肄之有條貫，似不宜分置。今悉依郭茂倩舊次，總列各代之末，而以作者名氏係之題下云。

[又] 鼓吹曲辭、舞曲歌辭，凡奏之公朝，列在樂官者，亦如前例，編錄於郊廟、燕射之後。其自相擬作，不入樂府者，仍存本集。

《古詩類苑》：樂府乃一代之典章，其作之有宮徵，肄之有條貫，不容分析破碎。今悉依郭茂倩舊次，彙為一部，以便覽觀。

(三)

《古詩紀》：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所載詩，多係摘句，今擇其闕文詩，各載於後。其雖似闕略猶能成章者，仍存正集，闕疑也。

《古詩類苑》：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所載詩，多係採摘，吉光片羽，不欲棄置，一二並存。

(四)

《古詩紀》：詩數見而句字不同者，參校其義稍長者為正文，餘分注其下，云一作某，或某書作某。

《古詩類苑》：詩數見而句字不同，取其義稍長者為正文，餘分注其下，曰一作某，或某書作某。

(五)

《古詩紀》：《道家歌詩》，出《列仙傳》、《真誥》、《雲笈七籤》等書，別為二卷，又鬼詩一卷，總曰「外集」。而仙詩止采其有名氏可據者。他如道經所載太上玉清真文、《九天生神章》，及道家科儀似五七言詩者，尚多不能備錄也。

《古詩類苑》：《道家歌詩》，出《列仙傳》、《真誥》等書，及仙詩、鬼詩、小說所載詩，雖多擬托，大都六朝人語也，今悉類入。他如道經所載《黃庭》二景、太上玉清真文之類，不能備錄。至如《易林》、《參同契》，并古詩之流也，以其義成一家且各有成書，亦不及焉。

(六)

《古詩紀》：隋唐間人，唐詩既收之，今不重錄。虞世南止取其在隋世應制

之作數首爾，其全集亦不及載。

《古詩類苑》：隋唐間人，唐詩既收之，今不重錄。如虞世南，止取其在隋世應制之作數首，不全載。

此相互出入之源起，為馮惟訥「因襲」張之象原書，抑或張之象（或俞顯卿等修訂者）借馮氏凡例為藍本？統觀之，馮氏凡例比張氏詳盡，雖不敢斷定，終似是現存《古詩類苑》把《古詩紀》原有的凡例簡單化了。如例（二），馮氏曰：「此乃一代之典章，非一人所得專也。」指的是樂府中特定某幾類（即郊廟、燕射歌），下面一則對鼓吹曲、舞曲做相對處理，並對「不入樂府者」（即文人詩歌傳統中的樂府詩）做特別交代。而《古詩類苑》似乎把樂府詩籠統看待，用馮惟訥的半句話——「一代之典章」——一言以蔽之。不過，即使其凡例不若馮氏凡例仔細，現存《古詩類苑》正文中對樂府詩的處理仍跟《古詩紀》一樣，把《古詩紀》所謂「奏之公朝」的詩單獨成卷（即卷三十三至四十五），把其他「不入樂府者」列在各類中。而《古詩紀》已稱「舊輯詩者咸析入各家集內」——《古詩類苑》在馮書「引用諸書」中，豈不是所謂「舊輯詩者」其中之一乎？此似乎可證明現存《古詩類苑》在體例上有所借鑑於《古詩紀》。

從《古詩類苑》對某些作品創作背景的介紹與對某些詩文注出異文看，它確實借用了《古詩紀》的不少材料¹⁶。至少，傳世的一六〇二年版《古詩類苑》修訂本參考過《古詩紀》。但至於它最早之稿本的原貌如何，筆者仍然認為現有的材料不足以讓我們做出判斷。如果再從上舉凡例舉一例比較，第六例《古詩紀》說：「隋唐間人，唐詩既收之。」此處「唐詩」為何，不甚清楚。後世讀者大概很容易聯想到《唐詩紀》，但是《唐詩紀》是馮惟訥逝世後，吳瑄等人編纂的，一五八五年付梓，跟馮惟訥沒有任何關係。馮氏在第一則凡例（即以上第一例）已謂：「唐宋以後詩人之作各有彙集，世得共睹。」則第六例「唐詩」或許是泛指這種彙集，如高棅(1350-1423)《唐詩品彙》之類的大型選集。但同一句話在《古詩類苑》卻講得很通順，「唐詩既收之」的「唐詩」，是第一則（上第一例）已提到的《唐詩類苑》。同一句話在甲處稍有不自然，乙處卻很清楚，與其說乙借之於甲，是否更應該考慮甲借之於乙的可能性？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《古詩類苑》凡例是一六〇二年

¹⁶ 阮籍的《詠懷詩》是較為鮮明的例子：《古詩類苑》的加注跟《古詩紀》完全一樣。這些注文與馮書體例甚相合，不太可能是馮惟訥抄自張之象的。

版的，這版顯明與《古詩紀》對校過，但我們不能排除一種可能，即馮惟訥《古詩紀》「引用諸書」中所引之《古詩類苑》原本已有一套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不完全一致的凡例，而馮氏寫其凡例時，曾以張氏原本之凡例為參考。

四、《古詩紀》第一版——一五六〇年「甄敬本」

以上尚未說及《古詩紀》的第一版，即一五六〇年在陝西付印的所謂「甄敬本」。吳琯本的汪道昆序、王世貞序，與吳琯自己加的凡例，無一例外均對甄敬本採取批評態度，如吳琯凡例說：「是編刻於關中，刻既不佳，校多遺誤……。」惟遼欽立擬重編《古詩紀》時，特別強調甄敬本「較吳本為善」，並舉出一些因為吳琯刪改原本而導致錯誤，以及後世讀者批評不當的地方¹⁷。甄敬本是否有很多錯誤為吳琯本糾正過，似乎尚未有人一一做比較，遼氏僅舉一二例，其具體情況可再做探討，茲不追究，但另有兩點值得指出。

首先，吳琯本諸序的批評，頗似自我標榜之說，疑非公道之論。如王世貞序謂甄敬本，云：「其刻既不能精，又無為之校訂者。」但檢視甄敬本則發現其刻工實甚「精佳」，而有「校訂者」若干名，甄敬本並不是隨便排印出書的。理所當然，作為馮書的第二版，吳琯本應該改正過一些原版的疏漏，但或許是汪道昆序的說法更近於事實，謂甄敬本「版之關中，坐踔遠而購之難」，是甄敬本流傳未廣，而不是甄敬本本身有多大的問題。第二，無論個別字句上孰佳孰欠，遼欽立之選擇甄敬本作為底本，有更根本性的原因。因為正像《四庫》本之對吳琯本做過一些或大或小的異動一樣，吳琯本改動了馮書原貌，吳琯刻本再「精佳」，遼氏仍須追溯第一版作為重編本的基礎。而對於我們了解《古詩紀》的編纂背景，以及它與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的關係，原版則提供了吳琯本所沒有的重要訊息。

甄敬本卷首是甄敬序，題作「嘉靖歲次庚申孟春，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兼提學校事太原甄敬」，庚申即西元一五六〇年。次為張四維序，題「嘉靖

¹⁷ 見遼著〈《古詩紀》補正敘例〉，載遼欽立遺著，吳云整理：《漢魏六朝文學論集》，頁112。此「《古詩紀》補正」乃後來成書的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初稿。關於甄敬本之勝於吳琯本，鈴木修次與一海知義亦曾略加考證，見其合著：〈馮惟訥とその詩紀〉，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1960年第20集，頁86-87。

戊午夏五月癸丑，賜進士第徵仕郎翰林院國史檢討河中張四維頓首拜書」，癸丑即一五五八年。次為馮惟訥凡例。凡例，如上所述，《四庫》本缺少最後十四則，但吳瑄本亦未為完備：吳瑄本前六則凡例為吳瑄所加寫的，下有注云：「以下悉是馮公舊例。」惟吳瑄缺原凡例第一則（即上節引凡例的第一例），第二則亦有改動。如此改動馮書原貌，雖說對一般讀者無甚影響，但可見馮欽立選擇甄敬本是有道理的，只有甄敬本才保存了馮書的原貌。凡例之後為「引用諸書」。在甄敬本先列「前集」——即先秦部分，一五五一年以《風雅廣逸》出版過——所引書，再列「正集」、「別集」、「外集」所引，此種順序亦為吳瑄所改動，吳瑄本簡單以四部分類法將引用書全部列在一起。吳瑄已將原書「前集」、「正集」合為一編，此處如果仍分前、正，便不合吳瑄新訂的體例，馮氏「引用諸書」原次序不得不改動，而且四部分法似亦較有利於讀者，一目了然。惟馮書原貌，亦有其佳處，例如「正集」書目所列《三國志》，下注一「別」字，表明《三國志》在提供了「正集」中魏、蜀、吳三國的詩歌以外，仍有些詩評方面的材料，收入馮書「別集」。此種注為吳瑄所刪，亦不無遺憾。

然馮惟訥《古詩紀》何以由甄敬在陝西付印？此一問題涉及馮惟訥任官行跡與馮書的編纂過程。馮惟訥，一五一三年出生於青州（今山東）臨朐縣的一個仕宦家庭，他五個兄弟中有四個考中舉人，兩個考中進士，前者包括後世以戲曲創作知名的馮惟敏；而馮惟訥在官場的表現最為出色，一五七二年以光祿卿致仕。單看他前半生任官歷程，一五三八年進士及第，先任常州府宜興縣縣令，後任官於山西、浙江、南京，從一五五五年起「出為陝西僉事，分巡隴右兼督學政，在鎮五年」¹⁸。是則甄敬本《古詩紀》之出版，恰好在馮惟訥任滿陝西的同一年，或可視為甄敬等人致敬於長官之舉¹⁹。

但是，《古詩紀》與甄敬、張四維的關係不僅如此。甄、張都是山西人，同在一五五三年進士及第，兩人淵源可見，而且據張四維序，馮惟訥是一五四四年任蒲州太守時開始編纂他的《古詩紀》，身為蒲州人的張四維，自己也參加過編纂工作。馮惟訥墓誌銘也稱他仕蒲州時，「暇嘗晉博士弟子俾執經問難，為剖疑義。士

¹⁸ 見〔明〕余繼登：〈明通奉大夫光祿寺卿少洲馮公墓誌銘〉，《淡然軒集》（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1291冊），卷6，頁2b。

¹⁹ 甄敬為文林郎，屬正七品，張四維為徵仕郎，屬從七品，官品均低於任陝西按察僉事、屬正五品的馮惟訥。

爭奮勵，舉於鄉者視昔三倍之」，下文還說蒲州人曾為他立去思碑。是則甄氏將馮惟訥《古詩紀》付之於梓、張氏為之寫序，是因為馮惟訥在他們老家有德政，對當地士族有所助益，而這本書也是在山西起草的，他們以此自豪。

甄敬本分前集、正集、外集、別集，正集又細分為漢—魏、晉、宋—齊，梁、陳、北朝、隋，共七部。每一部卷首題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太原甄敬 裁正」及「陝西按察司僉事北海馮惟訥 彙編」，每一部的最後一頁有「秦州知州李宋 督刊」，又列該部分「校正」人，每部校正人不同。這些人的名字，當然為吳琯本所刪，但正是「校正」人裏頭，給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，茲列之如下：

前集	簡州知州陳經正校正
漢魏	儒學學正馬騃校正
晉	伏羌縣儒學教諭周急校正
宋齊	華亭張之象月鹿校正
梁	蒲州儒學生員史喬科校正
陳	歙縣王寅虎文校正
北朝	儒學生員王邦多校正
隋	儒學生員白純校正
外集	儒學訓導馬儻校正
別集	儒學生員王瑤校正

除前集校正人陳經正外，其他校正人均為小官或地方儒學的生員，惟有兩名與他人不類，不屬官銜，一為「歙縣王寅虎文」²⁰，一為本文的中心人物——張之象（圖四）。是則馮惟訥編纂《古詩紀》時，不僅參考過張之象的《古詩類苑》，而且還請張之象親自幫他定稿²¹。

²⁰ 《明詩綜》及《江南通志》均有歙縣王寅，惟其字仲房，一字亮卿，與此處「虎文」有出入，不知如何解釋。據《江南通志》（卷 169，頁 7a），王寅「少為高才生，棄去遠游，傲儻自負，喜談兵，工詩習禪，自號十岳山人」。

²¹ 茲錄從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《古詩紀》1560 年本。惟筆者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檢視同版書，其漢魏（卷 19）、晉（卷 44）、宋—齊（卷 63）三部分均缺載督刊、校正人，其他部分所載則仍如上列，誠不知其何故。據國家圖書館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》，大陸地區尚有 17 家圖書館藏此書，張之象之缺與載，不知其孰為多。唯京都大學所藏本（見興膳宏監修：《嘉靖本古詩紀》〔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5-2006 年〕，第 2 冊，頁 170）所載人名與本文所引相同。而前引鈴木修次與一海知義〈馮惟訥とその詩紀〉一文亦留意到張之象之出

張之象何時參加過馮惟訥的編書過程，已無法追尋。照理，校正工作應該與定稿刻板時間相近，而上列諸校正人多數應該是陝西人或在陝西當官的²²。惟梁部為蒲州儒學史喬科校正，而上舉陳經正應該也是蒲州人²³，則馮書之校正或非一時一地所進行的。但也難以確定，因為也有可能是甄敬、張四維在校訂時藉他們山西老鄉之力。張之象一五五四年左右曾因「倭寇」侵擾而離開家鄉一段時間，不知道他那時候是否曾投奔馮惟訥幕下²⁴？或許更可能的是，早在一五四八年，馮惟訥任松江府太守時，馮氏拿他的初稿請當地頗有聲望的張之象過眼？就現有資料而言，張之象參加《古詩紀》編纂的具體情況，尚無法澄清。

五、馮惟訥在江東

在參與校訂一五六〇年版《古詩紀》諸多人當中，張之象顯得很特殊，既不是在當地做官，又不是陝西或山西人。恰好相對應，張氏墓誌銘稱「其所交與，盡宇內賢豪」，下列十四個當時有名氣的人物。十四人中有五個南京（金陵）人，有五個是張之象的同鄉華亭人（按：該墓誌銘作者莫如忠也是華亭人），有一個臨近郡吳興人。此外有兩個在南京做官的廣東（東粵）人，還有唯一一個北方人，就是馮惟訥。行文中提到的還有寧波（四明）人、杭州（武林）人、歙縣人，總之只有馮惟訥不是南方人。張之象人名、書名均出現在一五六〇年版《古詩紀》中，暗示著張氏與馮氏書有某種現今已無法說清的關係；而馮惟訥之名出現在張之象墓誌銘，可謂暗示著馮氏及其《古詩紀》與江東（長江下游，即吳地與其周圍）學術界的關係。

現在校正人中（頁 91，註 24），說這件事情「應該注意」，但並未提及《古詩類苑》之出現在《古詩紀》引用書目中。

²² 此諸人大抵不可考，但如晉部校正人周急在伏羌縣儒學，而隋部校正人白純，《陝西通志》（〔清〕劉於義等監修〔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 552 冊〕，卷 32，頁 67a）貢生中有一名，可能是同一個人。

²³ 《山西通志》（〔清〕覺羅石麟等監修〔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 544 冊〕，卷 68，頁 30a）有一名陳經正，1534 年舉人，是蒲州人，意與此處為同一個人。

²⁴ 張之象為「倭寇」而逃避，可從他現存幾首詩作看出，如「亂後經故居感懷」與「避地吳興次余伯臣韻」。見〔明〕俞憲（1538 年進士）編：《盛明百家詩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，第 306 冊，頁 429。

一本著作的成書過程，往往不是獨自進行的，不是在真空的環境中寫出來的，而是在當時學術風氣之下形成的，是在它同時代的其他著作的刺激之下寫出來的。《古詩紀》無疑也是這個樣子，而馮惟訥毫無自占其成之意，在他的「引用諸書」裏頭舉出不少與他同時或比他稍前的詩歌總集，張之象的《古詩類苑》只是其中之一。對馮書產生影響的，不得不先提到楊慎，「引用諸書」中有三部楊慎的著作，即《風雅逸篇》（曾在一五五一年出版的《風雅廣逸》，即《古詩紀》前集的前身，係以此為基礎）、《五言律祖》（蒐集齊梁時期之類律詩者）與《選詩外編》（即對《文選》的擴充），均為明人蒐集唐前歌詩之濫觴。惟楊慎對當時影響頗大，當另作別論²⁵，而其他「引用諸書」中較重要的總集，則大都與江東學者有關，茲將其中幾部介紹如下。

例如《六朝聲偶》七卷，徐獻忠(1493-1569)撰，《四庫存目提要》謂其以楊慎《五言律祖》為基礎²⁶。徐獻忠與張之象同鄉，而兩人常被相提並論，如上文所提到，徐、張與何良俊、董宜陽有當地「四賢」之稱。馮惟訥與此群人關係，除張之象外，今僅見其蛛絲馬跡，例如一五五一年出版的《風雅廣逸》，據馮惟訥序係由蘇州賢豪喬啟仁付印，此喬啟仁有一「西園」，常於此地宴客，一五五〇年代將其諸客宴中詩作都結為一集，請何良俊作序²⁷。又，當地有一蔡琳泉，以文才見稱，據其墓誌銘所載，曾經參與過四本大總集的編纂，即：張之象兩部總集，何良俊所編《語林》（或稱《何氏語林》，為《世說新語》的續集），與馮惟訥《古詩紀》²⁸。

²⁵ 按：楊慎為當時皇帝世宗所憎恨，而1551年馮惟訥《風雅廣逸》出版，仍得以極其尊敬口吻介紹楊慎原作，並附有楊慎《風雅廣逸》原序——豈非明人較有言論自由之證？

²⁶ 與馮惟訥《風雅廣逸》不同，《六朝聲偶》編者序未嘗提到楊慎以及《五言律祖》，提要之說，仍須再做檢討。

²⁷ 此序見《明文海》，卷301，頁3b。又，《盛明百家詩》有《馮少洲詩集》，載其在江東詩作多篇，應可對馮氏與江東人關係提供更多資料。

²⁸ 見〔明〕王世貞：〈蔡孝廉琳泉墓誌銘〉，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0年《明人文集叢刊》第22種第12冊），卷124，頁5a提到：「既名成，而雲間張玄超氏聘之校閱《古今秋文》，甚相洽也。其宦錢塘而以御史檄編《唐詩分類》，亦孝廉佐之。他若顧汝脩兄弟之《印藪》，何元朗之《語林》，馮汝言之《詩紀》，俱孝廉與有力焉。」按：此處稱張之象之唐詩總集為《分類》，與《類苑》之名相類，此《唐詩類苑》非由《詩紀類林》析出之又一證。

還有一本《六朝詩集》，共收二十四個魏晉南北朝人集子。此著與一般的總集不同，應該是固有別集的匯合²⁹。不題撰者名，惟卷首有一五四三年薛應旂序，薛應旂為常州武進人，馮惟訥一五四〇年任宜興令，宜興亦屬常州，則此書之編纂，或在馮惟訥任官時。無論如何，可證明馮惟訥的詩歌蒐集工作，在吳地已有人在進行³⁰。而馮惟訥參考書中的吳地人著述還有張之象同鄉包節（一五三二年進士）所編《苑詩類選》三十卷，此書乃《文苑英華》詩歌整理本。另外值得提及的是《廣文選》，編者劉節為揚州人，有一五三二年序。此書原八十卷，收唐以前作品二千餘篇，比《文選》多將近三倍，為當時蒐集六朝文學之一巨著³¹。只可惜今天無法看到當時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為何面貌，不知其原規模有多大。

上舉諸書，或以證《古詩紀》與江東學術風氣之淵源，或以示馮書之編纂實非由馮惟訥一人或馮惟訥手下諸人之功；而與馮書關係最為密切的江東人所編總集，應推《六朝詩彙》。《古詩紀》凡例（按：此條不見《四庫》本）云：「漢以後箴銘頌贊，各自為體，今不及載。」原注曰：「《詩彙》所載，今並刪去。」可見馮惟訥曾以是書為主要參考資料，甚至以為晉以下部分之藍本³²。《六朝詩彙》一一四卷，原編者為慈溪（今寧波）人張謙（一五三二年進士），但原書已不得見，今傳本為義烏（今金華）人王宗聖（一五四四年進士）所「增補」，一五五二年在蘇州出版。跟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一樣，已經無法確認此書與馮書具體關係，馮氏一五四八

²⁹ 近人研究《六朝詩集》，有岡村繁〈關於《六朝詩集》及其所收《鮑氏集》〉，原著 1965 年出版，中文譯本載《漢魏六朝思想和文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《岡村繁全集》，第 3 卷），頁 482-512；與楊焄〈明刻本《六朝詩集》編纂考〉，《上海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2007 年第 5 期，頁 81-85。兩篇文章從不同方面證明《六朝詩集》所收別集的文獻價值。

³⁰ 此書編纂者，楊焄認為是蔣孝，與薛應旂同為常州人，因為蔣孝編過一部《中唐十二家集》，與《六朝詩集》性質相似，而《中唐》亦載薛應旂序，兩書版工也一樣。見氏著：〈明刻本《六朝詩集》〉，頁 82。

³¹ 今只見此書 1537 年「校正」本，60 卷，據校正凡例，此本刪去原書 274 篇，外加了 30 篇。見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，第 297-298 冊。

³² 後世多有人批評馮惟訥之收作標準，謂其不應收詩歌以外之作，殊不知馮惟訥同時人所輯，如張之象《類苑》與此《六朝詩彙》等，均對「箴銘頌贊」予以收載，而馮惟訥乃特地刪掉此材料，使時人王世貞曾謂：「遠則延壽《易林》、《山海經》圖贊，近而周興嗣《千字》，皆在所遺，恐當補錄。」（見羅仲鼎校注：《藝苑卮言校注》〔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2 年〕，卷 7，頁 352）仍覺《古詩紀》收作不夠全。

年有初稿，此時可能已看到《詩彙》之第一版，或未版之抄本，也有可能馮惟訥初稿已成才看到這本書，乃以之對校自己的成果。兩書的形式極其相似，但《六朝詩彙》終稍嫌粗糙，如一詩人名下諸詩篇往往有些紊亂，不如馮書之有系統，此似乎表明馮惟訥是在《詩彙》基礎上做過一些改良，然仍難以確知，仍須對兩本書做仔細比較。《詩彙》所收，始於西晉，終於隋，前有「詩人姓氏爵里」（即極其簡短之作者小傳）與「六朝詩評」；《古詩紀》也有小傳與詩評，比《詩彙》詳盡，此亦馮書勝過《詩彙》之處，同樣有可能是此編影響馮惟訥之處。而《詩彙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從西晉一脈而下，無所不收地把中古詩歌全部依時序排列。對唐以前詩歌採取這種編年方法，是前所未有的，而這正是馮惟訥《古詩紀》見稱於當時的一個原因，如張四維一五五八年《詩紀》序所言：

詩以人系，人以代分，代以時次。火齊明月，的鑠錯陳；鏞磬祝啟，翕如並奏。使藝林之士，因詩考人，因人論世，得以繹祖述之淵源，第古今之優劣，獵皇王之菁華，而窮性術之變化也。³³

如上所說，《古詩紀》確實比較有條理，才稱得上「火齊明月」，但是，由晉至隋，將「詩以人系，人以代分，代以時次」的著作，應該首推《六朝詩彙》。當然，跟《古詩紀》與《古詩類苑》情況一樣，《六朝詩彙》雖然列在馮書引用書目中，我們仍然看不出這兩本書的具體關係：例如，如果說《六朝詩彙》編者曾以馮書未刊稿為參考，《六朝詩彙》書成後馮惟訥有所過目，而在《古詩紀》出版時將《詩彙》收入其引用書目中，以表他人之功——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總之，馮惟訥與他的大著《古詩紀》，與江東學者此方面的研究有一定關係，此從馮氏與張之象的關係可以看出，從《古詩紀》與其他江東著述的關係也可以看出。可試想：馮惟訥三次於江東做官，最早是一五四〇年，他第一次任官，做宜興令；他年輕力壯時來到此學術根深之地，理應深受其影響，幾年後在蒲州開始編纂他的《古詩紀》，當在此江東學術影響之下。一五四八年任松江太守，以長官的身分帶著《古詩紀》的初稿加入當地包含張之象在內的人文圈子，而一五五一年其《風雅廣逸》（即《古詩紀》前集）由蘇州名紳推出。十年後，一五六二年任浙江提學副使，彼時《古詩紀》在陝西已出版，其中漢魏部分一五五九年亦在武昌單獨

³³ 〈《詩紀》序〉，見馮維訥著：《詩紀》（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560 年「甄敬本」），序卷，頁 8a。

印行³⁴，據墓誌銘所載，馮氏在浙時「廣布條教，以示左質右文之意。士習翕然咸歸於正」。又稱：「〔江東〕士大夫嘆服，謂二百年所未見，若小民又人人肖像於室，飲食必祝矣。」³⁵其德蹟如此見稱，或屬墓誌銘之誇辭，但馮惟訥之所以見重於江南士族，或許亦與其《古詩紀》為江南學術之集大成者有關？

六、結 語

馮惟訥《古詩紀》，實為一集大成之作，他參考前人與同時代人已蒐集之成果，編出一部眉目清晰、材料詳盡、考證齊全的總集。我們現在拿它跟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比，可能覺得它在材料蒐集與異文校勘方面都不如人意，但在它自己的時代，《古詩紀》確實是一部嚴謹的詩歌研究作品。只是不能忽略它與當時其他著作——如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、張謙《六朝詩彙》等的關係。張四維《詩紀》序所言：

先生宦跡且徧四方矣。遇通儒博士，無不出而訂焉。驟見之編，郡邑之載，金石之刻，無不取而覈焉。³⁶

「無不出而訂焉」，蓋謂馮惟訥編此書時廣延同好，求當時對此事業有興趣之人合作，而「驟見之編」，正謂如張之象等人之著作，馮惟訥積極吸收其成果，始能成《古詩紀》之美。

附記

本文所引用古籍如下：

《古詩紀》（原名《詩紀》）：

- （一）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一五六〇年「甄敬本」；又，同版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（僅檢視微卷）。
- （二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「吳瑄本」，當為一五八六年版。

³⁴ 〔清〕邁柱等監修：《湖廣通志》（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534冊），卷101，頁44a-45b 載此《漢魏詩紀》序，冠以「武昌刻」三字，故以知。

³⁵ 據墓誌銘載，馮惟訥其他著作還有《楚辭旁註》、《選詩約註》、《文獻通考纂要》、《唐音翼》與《杜律刪註》，惟不知為何時完成，以及是否曾版行。

³⁶ 〈《詩紀》序〉，頁6b。

(三)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「馮珣、黃承玄本」，一六一三年版（微卷）。

(四) 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《古詩類苑》：

(一) 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。

(二) 中島敏夫整理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影印。

《風雅廣逸》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一五五一年版（微卷）。

《漢魏詩紀》：傅斯年圖書館藏一五五九年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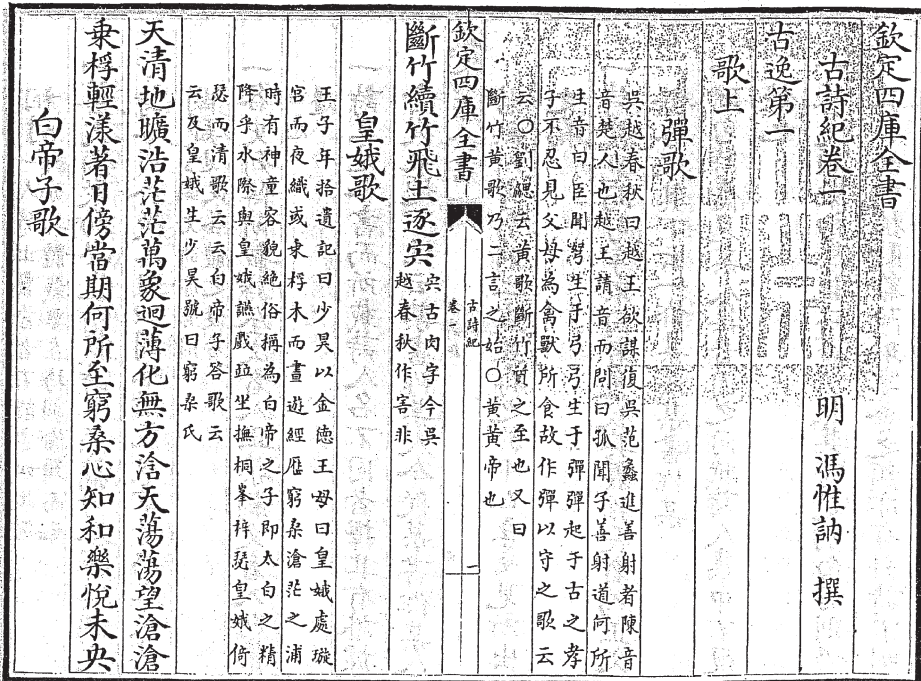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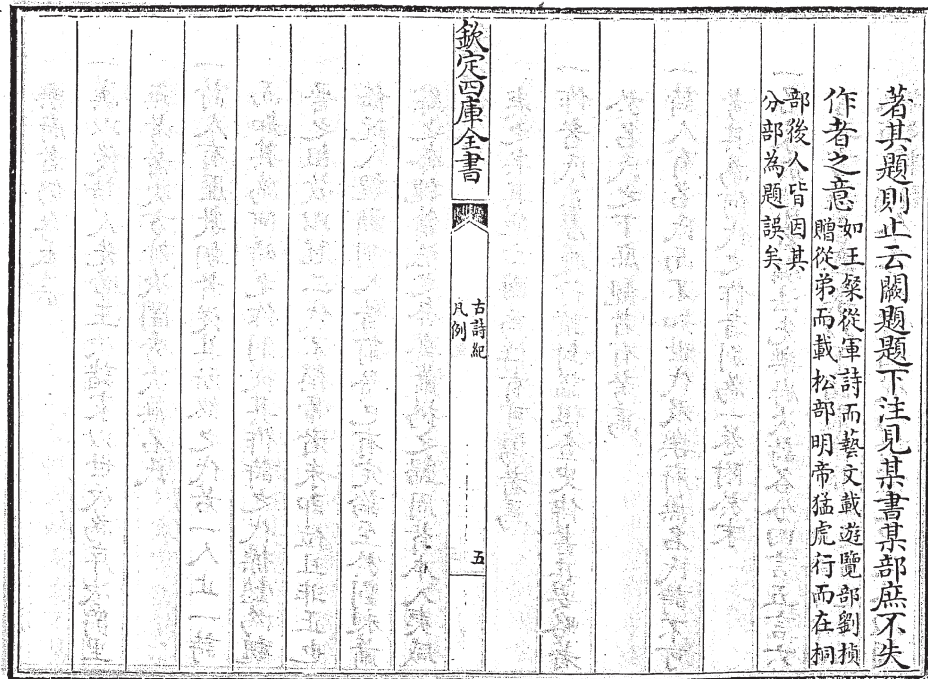
《六朝詩彙》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五五二年版（微卷）。

中島敏夫氏所整理《古詩類苑》，後附作者、篇目等所引多種，頗便於研究（按：中島另有《唐詩類苑》，亦有所引）。《古詩紀》，以及現在代替它的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均以時間線為主，歷來研究者大都謂須如此始「足見作者源流」（《四庫提要·詩紀匡謬》語）。從某種觀點，或者說從歷史主義觀點出發，這種著作的確比較適合研究用途，但是，如今詩歌研究不免有所囿於歷史主義，對「源流」之重視過多，須知詩歌可從多種方面入手，時間線只是一種而已。張之象《古詩類苑》以類為別，今日如果用其書為研究出發點，或許將有助於對古典詩歌找出新視角？正如黃體仁〈《古詩類苑》敘〉所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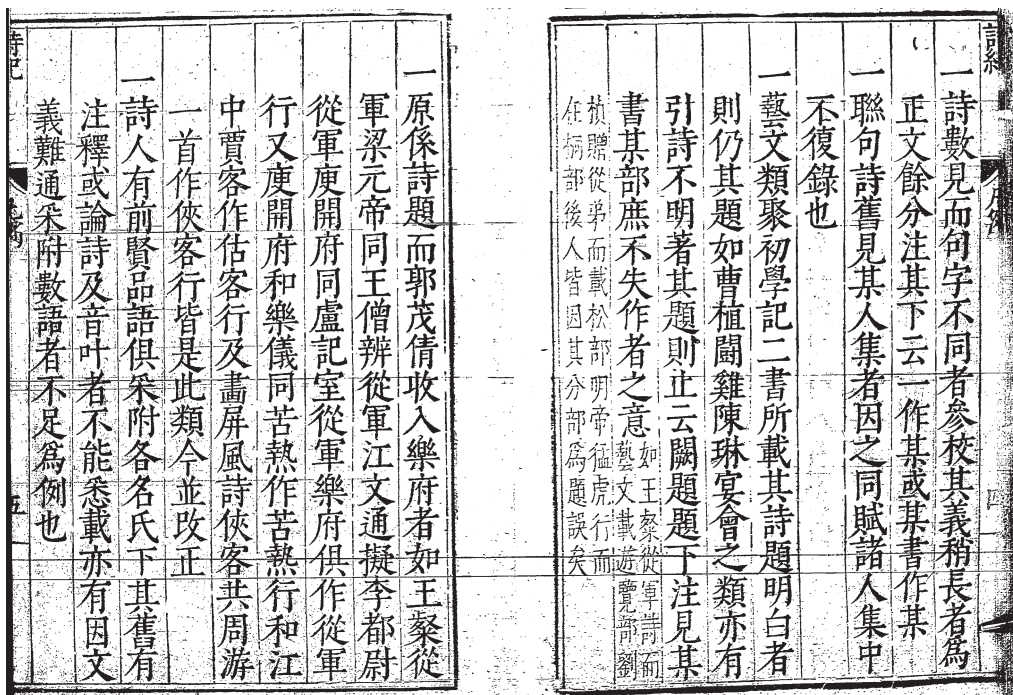
如醫師藥籠中物，若辛若甘若寒與熱，自水碧金膏以至牛溲馬澣，種種之備具，及其臨時調劑，或辛而代甘者之用，或寒而濟熱者之所不足，參合之妙，則又存乎其人，是則玄超之意也。³⁷

³⁷ 《古詩類苑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，第320冊），序卷，頁5b-6a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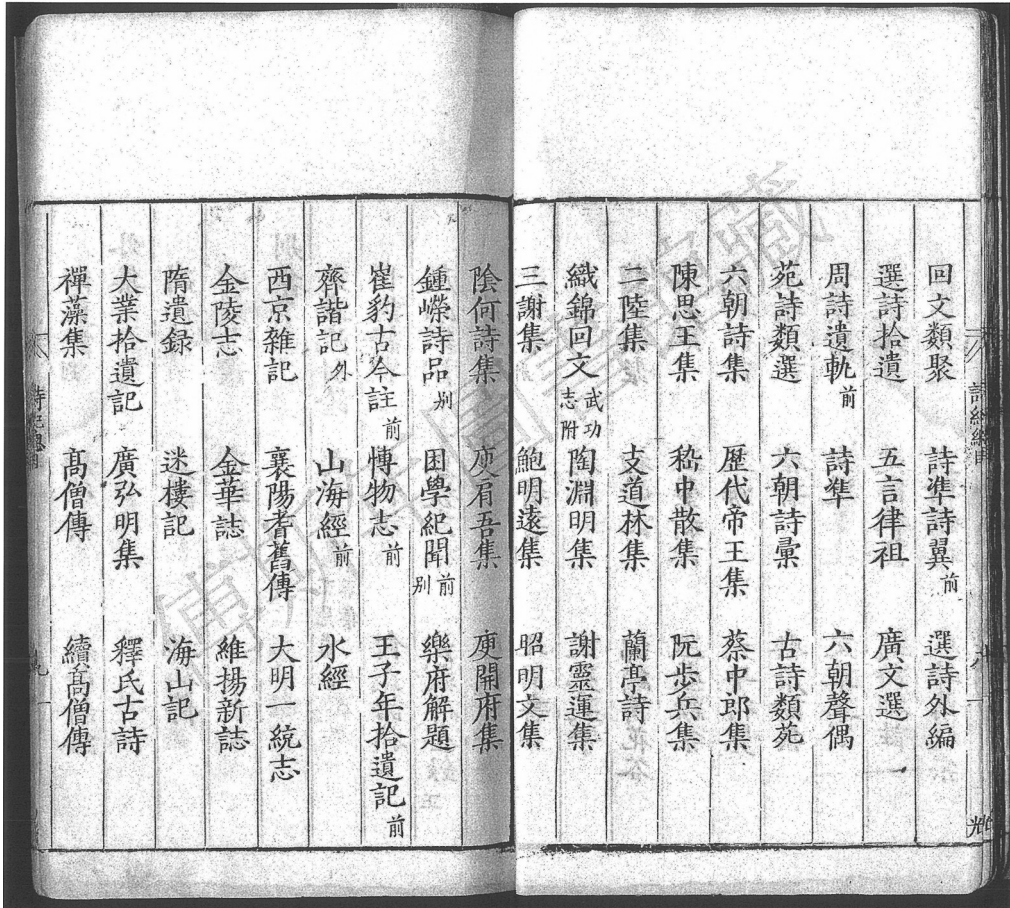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：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古詩紀》



圖二：吳琯本《詩紀》（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）



圖三：甄敬本《詩紀》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本）



圖四：甄敬本《詩紀》（傅斯年圖書館藏本）

